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Japan**

**授课教师**包霞琴 教授

**助教**王龙升

**目录**

[第一讲 日本战败与“维护国体论” 4](#_Toc197616161)

[一、何为“大东亚战争” 4](#_Toc197616162)

[（一）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战略思想 4](#_Toc197616163)

[（二）“大东亚共荣圈” 5](#_Toc197616164)

[二、“维护国体论” 5](#_Toc197616165)

[（一）稳健派登场 5](#_Toc197616166)

[（二）波茨坦公告与日本投降 6](#_Toc197616167)

[第二讲 美国占领与新宪法的诞生 6](#_Toc197616168)

[一、美国的占领政策 6](#_Toc197616169)

[（一）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构想 6](#_Toc197616170)

[（二）美国的早期占领政策 7](#_Toc197616171)

[（三）东京审判 7](#_Toc197616172)

[二、冷战的爆发与美国占领政策的调整 8](#_Toc197616173)

[（一）美国占领政策调整 8](#_Toc197616174)

[（二）片面媾和与全面媾和之争 8](#_Toc197616175)

[三、“旧金山会议”与“旧金山和约” 8](#_Toc197616176)

[（一）“旧金山和约” 8](#_Toc197616177)

[（二）日华和平条约 9](#_Toc197616178)

[（三）新中国的对日政策 10](#_Toc197616179)

[第三讲 从政党林立到“55年体制”的确立 10](#_Toc197616180)

[一、日本政党政治历史 10](#_Toc197616181)

[（一）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党政治 10](#_Toc197616182)

[（二）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政党政治 11](#_Toc197616183)

[（三）战后的日本政党政治 11](#_Toc197616184)

[二、“55年体制”的形成与崩溃 12](#_Toc197616185)

[（一）整肃 12](#_Toc197616186)

[（二）社会党与自民党 12](#_Toc197616187)

[（三）“55年体制”的特征 12](#_Toc197616188)

[（四）“55年体制”的崩溃 13](#_Toc197616189)

[第四讲 “反吉田路线”的鸠山一郎内阁与岸信介内阁 13](#_Toc197616190)

[一、“鸠山热”与日苏邦交正常化 13](#_Toc197616191)

[（一）“鸠山热” 13](#_Toc197616192)

[（二）日苏邦交正常化 14](#_Toc197616193)

[二、岸信介的强权政治与外交 15](#_Toc197616194)

[（一）岸信介的外交主张 15](#_Toc197616195)

[（二）赔偿外交与积极的东南亚外交 15](#_Toc197616196)

[（三）反共亲蒋的对华政策 16](#_Toc197616197)

[（四）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16](#_Toc197616198)

[第五讲 池田内阁与佐藤内阁的政治与外交 17](#_Toc197616199)

[第六讲 七十年代的日本外交 17](#_Toc197616200)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 17](#_Toc197616201)

[（一）中日民间外交 17](#_Toc197616202)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18](#_Toc197616203)

[（三）《中日联合声明》 19](#_Toc197616204)

[二、尼克松冲击与自主外交的提出 19](#_Toc197616205)

[（一）尼克松冲击 19](#_Toc197616206)

[（二）田中内阁的“自主外交” 19](#_Toc197616207)

[三、福田内阁的全方位外交 20](#_Toc197616208)

[（一）福田内阁的东南亚外交 20](#_Toc197616209)

[（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21](#_Toc197616210)

[四、一亿中流意识及其产生背景 21](#_Toc197616211)

[（一）一亿中流意识的产生背景 21](#_Toc197616212)

[（二）一亿中流意识 22](#_Toc197616213)

[第七讲 八十年代的日本外交 22](#_Toc197616214)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外交战略的调整 22](#_Toc197616215)

[（一）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23](#_Toc197616216)

[（二）中曾根主义 23](#_Toc197616217)

[（三）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23](#_Toc197616218)

[二、八十年代日本对华外交 23](#_Toc197616219)

[第八讲 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与突破 24](#_Toc197616220)

[一、冷战时期：专守防卫 24](#_Toc197616221)

[二、冷战后：尝试突破专守防卫 24](#_Toc197616222)

[（一）90年代：应对朝核问题和台湾海峡危机 24](#_Toc197616223)

[（二）21世纪：配合美国反恐 25](#_Toc197616224)

[三、安倍第二次上任后的防卫政策 25](#_Toc197616225)

[（一）《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25](#_Toc197616226)

[（二）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26](#_Toc197616227)

[（三）安倍“新安保法案” 27](#_Toc197616228)

[四、俄乌冲突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 28](#_Toc197616229)

[第九讲 安倍内阁对东南亚海上防务合作的制度化建设 28](#_Toc197616230)

[一、安倍内阁的东南亚外交战略理念与定位 29](#_Toc197616231)

[（一）“安倍主义”的提出及其内容 29](#_Toc197616232)

[（二）“安倍主义”的特点 29](#_Toc197616233)

[（三）安倍时期日本对东南亚防务合作的发展方向与重点领域 29](#_Toc197616234)

[（四）安倍时期日本对东南亚防务合作的特点 30](#_Toc197616235)

[二、日本-东南亚海上防务合作机制的案例 31](#_Toc197616236)

[（一）日印尼海上防务合作机制的建设 31](#_Toc197616237)

[（二）日菲海上防务合作机制的建设 31](#_Toc197616238)

[（三）日越海上防务合作机制的建设 31](#_Toc197616239)

[三、“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 32](#_Toc197616240)

[（一）“积极和平主义” 32](#_Toc197616241)

[（二）日本对东南亚ODA外交中的“安全化”趋势 32](#_Toc197616242)

[四、日本扩大东南亚海上防务合作的国际背景 33](#_Toc197616243)

[（一）美国因素的影响与日本战略自主性的提高 33](#_Toc197616244)

[（二）牵制与对冲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 33](#_Toc197616245)

[（三）东南亚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意愿 34](#_Toc197616246)

[五、防务合作制度化建设的实际效果与制约因素 34](#_Toc197616247)

[第十讲 安倍内阁介入南海问题的路径 34](#_Toc197616248)

[一、1990年至2012年的南海政策 34](#_Toc197616249)

[（一）试图将中国拉入多边机制框架下讨论南海问题 34](#_Toc197616250)

[（二）日本政府总体保持克制、低调，避免过多干预 35](#_Toc197616251)

[（三）以非传统安全问题为由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安全合作 35](#_Toc197616252)

[（四）开始参加多边军事演习 35](#_Toc197616253)

[二、2012年后“深度介入”的南海政策 35](#_Toc197616254)

[（一）加强东南亚安全外交，挑起南海各方对立 35](#_Toc197616255)

[（二）深化日美合作，并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等域外大国介入 36](#_Toc197616256)

[（三）通过多边国际外交场合牵制中国南海政策 36](#_Toc197616257)

[第十一讲 冷战结束后的日本对华认知及其特点 36](#_Toc197616258)

[一、90年代的日本对华认知 36](#_Toc197616259)

[二、21世纪前10年的日本对华认知 37](#_Toc197616260)

[三、2010年之后的日本对华认知 37](#_Toc197616261)

[四、“转型期” 37](#_Toc197616262)

[（一）90年代后的日本转型 37](#_Toc197616263)

[（二）亚太秩序的转型 38](#_Toc197616264)

[（三）转型期的不确定性 38](#_Toc197616265)

第一讲 日本战败与“维护国体论”

2025.2.27

一、何为“大东亚战争”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有不同的说法，如“15年战争”“太平洋战争”等，而当时最流行的“大东亚战争”的称呼，其思想渊源是“大东亚共荣圈”。而要了解这一思想渊源是如何形成的，就要回顾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思想。

（一）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战略思想

1. 明治维新

在明治维新之前，德川幕府统治着日本，即江户时代。当时的德川幕府采取了“锁国”政策，既不与外界进行贸易来往，又断绝了与中国的朝贡关系。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舰来日，即“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的国门。1854年，《日美和亲条约》签订，这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54年至1859年，日本又与法、荷、俄、英签订了《安政五国条约》，同样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就是与西方列强修改这些条约，直到1900年这些不平等条约才或修改或废除。

面对列强的威胁，当时的日本社会产生了两种对策：一种是“尊王攘夷论”，要求推翻当时实权统治的德川幕府，实现王政复古；这一论调最终导向了明治维新；另一种是“开国论”，即主动开国，与西方各国协调，向西方列强学习。在明治时代的前期，“开国论”占了主流，日本开始在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西方学习，甚至达到了“崇洋媚外”的地步。

2. “脱亚论”与“兴亚论”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学习西方，逐渐形成了西式的议会、政党、宪法等。但日本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天皇，因而宪法也与西方各国有较大不同。近代以后，“兴亚论”和“脱亚论”是最主要的两大思潮：脱亚论主张“脱亚入欧”，强调与西方列强相协调，共同侵略亚洲国家；兴亚论主张“大亚洲主义”，强调“亚洲连带”，认同东方文化，团结合作共同抵御西方，由日本作为亚洲盟主，与西方列强抗衡。亚洲主义是一种思想与行动的总称，与东亚各国民族危机和民族觉醒相联，在不同时期有特定的内容与含义。

1885年，福泽谕吉撰写了《脱亚论》，主张“脱中国化”，是脱亚论的代表；他认为，在西方列强主导的“适者生存”世界，从中国而来的儒家思想已不适用，只有强化自身才能博得世界上的一席之地。脱亚论也是当时日本官方采纳的思想。1893年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则是兴亚论的代表，他本人在之后也创立了“东洋社会党”，但影响力没有脱亚论大。

在这一时期，虽然脱亚论是主流，但日本也涌现出了各类兴亚论的组织机构，如“振亚会”“兴亚会”“东亚会”等。其中，1898年由近卫笃麿建立的“东亚同文会”还接受了政府的补助金。一些兴亚论的组织还与孙中山的同盟会联系密切，希望同盟会在推翻清王朝后再来改造日本。在这一时期，亚洲主义还是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

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拥有殖民地的亚洲国家，日本的中国观发生本质性变化，“日本盟主论”甚嚣尘上。这一时期，“日本盟主论”的代表作有内村鉴三《代表性的日本人》（1894）、新渡户稻造《武士道》（1899）、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1903）《东洋的觉醒》（1904）等。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了辽东半岛，但随后在三国干涉的压力下被迫归还，当时的日本将此视为耻辱，为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日俄战争后，列强加速瓜分中国，为独占中国、排除列强而提出的“中国保全论”又开始在日本兴起，犬养毅的“东亚会”、近卫笃麿的“同文会”都支持这一观点，甚至于“东亚同文会”纲领的第一条就是“保全中国”。

关于当时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也有所关注，如章太炎于1897年发表的《论亚洲自为唇齿》，以及1919年李大钊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霸权文化，也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今后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的慎择。

——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

3. “中国瓜分论”

1918年一战结束后，日本是战胜国，在中国获得了大量利益，成为了国际联盟五大国之一；日本成为了“列强”之一，但遭到了英美的排挤，日本认为这是对自身的不公平。1918年，近卫笃麿之子近卫文麿发表了《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近卫家族是天皇所封的贵族，有权参政，近卫文麿也因其父亲身份而很早就进入了政界，在其中平步青云，历任贵族院议员、副议长、议长，第34、38、39任内阁总理大臣。

当然，当时日本的实力还未及英美，因此日本国内也有以币原喜重郎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协调外交”，与西方缓和。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田中义一上台后，日本开始推行对西方的强硬外交，甚至在之后退出了国联。

（二）“大东亚共荣圈”

20世纪20年代之后，日本的扩张遇到了两大阻力。第一是中国的民族主义：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民族工业近代化开始，反日抗日情绪逐渐高涨。第二是西方列强的抵制和排挤，如1924年美国的“排日移民法”。

由上述两大阻力，在30年代后，日本决定从“脱亚入欧”转向了“排欧入亚”。1937年，近卫文麿上台，宣告建立所谓的“日满华东亚新秩序”；1942年，日本宣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将其范围扩大到东南亚。在具体方针方面，日本采取南进政策。1940年9月，《德意日同盟条约》签订；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签订》；10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成立。

在很大程度上，“大东亚战争”的名称来自于其发生的地域。在当时的日本，还设有“大东亚省”，供日本各傀儡政权内部会晤商谈。

二、“维护国体论”

（一）稳健派登场

1943年起，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反攻；5月的阿留申群岛战役与7月的塞班岛战役对日本军力与士气造成了重大打击。1944年7月18日，东条内阁辞职；22日，小矶国昭上台，提出“保卫成果的和平论”，但盟国并未接受。1945年4月1日，美军攻占冲绳岛；5日，小矶内阁下台；7日，军部的铃木贯太郎上台，其迫在眉睫的事务也是求和。当时，日本的军部在寻求“本土决战”“一亿玉碎”；外务省则在寻找外交突破口，其一个方案是寻求苏联的斡旋，但彼时苏联已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诺了对日开战，此事不了了之。

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之时，外务省出身的东乡茂德、近卫文麿、吉田茂等稳健派文官开始涌现，他们提出“维护国体论”，即维持战后日本的天皇制。他们认为应尽快结束战争，一方面是针对主张“本土决战”的军部，另一方面是针对日渐壮大的日本共产党势力。

1945年2月，近卫等人上书天皇，认为“在维护国体方面最值得担忧的不是战败，而是因战败而可能爆发的共产主义革命”。稳健派的主张得到了天皇支持；此后，天皇逐渐由支持军部转为支持稳健派文官，终战处理工作的主导权也被稳健派掌控。

（二）波茨坦公告与日本投降

7月26日，中英美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政府不认为（公告）有何重大价值，吾等惟有将战争进行到底。

——铃木贯太郎内阁

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长崎原子弹爆炸。14日，在稳健派的支持下，天皇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投降事宜；15日，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在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上下陷入了一定时期的混乱，军部要求从稳健派手中“夺回天皇”，也有军部成员集体自杀；日本民众也对此感到迷惑。

日本投降后，军部已不成气候，近卫文麿等部分政要也被判为战犯。17日，东久迩宫稔彦组建了临时内阁。在此后日本的混乱时期内，稳健派与盟军驻日司令部的人员站了出来，成为了压制混乱、重建国家的重要力量。

第二讲 美国占领与新宪法的诞生

2025.3.6

一、美国的占领政策

（一）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构想

美国占领日本的目标是将其建成“民主和平国家”，不再成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威胁。早在1944年5月，美国就发布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对日目标》，其中包括两点：第一，非军事化改革，使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及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威胁；第二，民主化改革，在日本建立尊重别国权利和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

占领日本的虽然是“盟军司令部”，但其中基本上都是美国人员，包括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军人和以惠特尼为代表的民政局文官。麦克阿瑟一到日本，就解散了日本的军队（大本营）和警察。惠特尼则草拟了《告日本国民书》，其中规定：

1. 把天皇置于盟军最高统帅的指挥之下；
2. 禁止流通日币，使用美军军票；
3. 封闭法院，案件均由美军军事法庭审理。

这份文件的条款十分严苛，但在稳健派对麦克阿瑟的沟通与说服下，其并未颁布；之后对日本的占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严厉。1945年10月9日，东久迩宫稔彦内阁因其中大部分成员与战争有直接关系而被迫下台，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吉田茂任外相。根据麦克阿瑟的要求，这个要组建的内阁应是亲美政权，其必须对美国不反感，没有战争嫌疑，并且通晓外交；因此，主张协调外交、亲美外交的币原喜重郎，以及曾担任驻英大使、反对太平洋战争的吉田茂就是很合适的人选。

（二）美国的早期占领政策

美国的早期占领政策包括非军事化政策和民主化政策：

1. 非军事化政策
   1. 解除日军武装，解散军事机构；
   2. 逮捕战犯，整肃右翼；
   3. 加重战争赔偿，达到经济非军事化。
2. 民主化政策
   1. 五大改革令；
      1. 妇女解放与参政；
      2. 保障工人结社权、交涉权，鼓励成立工会、政党；
      3. 教育民主化与自由化；
      4. 司法制度改革，废除秘密司法制度；
      5. 经济机构民主化。
   2. 解散财团，土地改革；
   3. 制定新宪法。

其中，新宪法的基本原则有：

1. 强调主权在民，推行象征天皇制；
2. 放弃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3. 实行议会民主，责任内阁制；
4. 地方自治政权；
5. “刚性”宪法：修宪需获得参众两院2/3以上支持，再进行全民表决，1/2以上支持才可修改。

**第九条**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日本国宪法》

（三）东京审判

美国占领的第一阶段是军事阶段，即非军事化和民主化（1945.8~1948.10），包括停止军需生产、解散军队、逮捕战犯；颁布人权指令（自由言论、释放政治犯、彻底废除思想警察等）；民主化五大改革指令（妇女解放、鼓励成立工会、学校教育民主化、废除秘密审问司法制度、经济机构民主化）等。

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的东京审判没有追究天皇责任；28名甲级战犯被起诉，7名被判处绞刑（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武藤章）、16名无期徒刑（如东乡茂德〔20年〕、重光葵〔7年〕），大川周明免除追诉，2名判决前病死（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天皇被免除战争责任是基于麦克阿瑟稳定日本、推行占领政策的需要而导致的，天皇本人作为日本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战争都由他最终决定，因此其不负有战争罪行的说法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二、冷战的爆发与美国占领政策的调整

（一）美国占领政策调整

美国占领的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即对日占领政策的调整（1948.10~1950.6），重整军备、红色整肃。第三阶段则是扶植（经济）阶段。

冷战爆发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着力帮助日本恢复经济，由加重战争赔偿转为终止赔偿，进行了道奇经济改革。此外，美国还支持日本政府加强治安、压制民主势力，即所谓“赤色整肃”。

美国帮助日本重整军备。1948年5月，海上保安厅成立。1950年8月，75000人的“警察预备队”成立。1952年，将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成立保安大学。1954年，《防卫厅设置法》《自卫队法》颁布，建立自卫队，保安大学改为防卫大学。可见，这一时期，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的变化是：

* **经济上：**严格限制→大力扶持；
* **政治上：**惩罚右翼→镇压左翼；
* **军事上：**非军事化→武装日本。

（二）片面媾和与全面媾和之争

保革对立是日本战后政治力量的基本形态。基于这一情况，对战后日本的道路，就有了三条路线之争：

* **保守力量：**吉田路线（轻武装、重经济、向美一边倒）；
* **革新力量：**非武装中立路线（轻武装、和平外交、中立国家）；
* **岸信介、鸠山一郎等人：**武装自立路线（重整军备、制定自主宪法、对美独立）。

在战后主要推行的是保守力量的吉田路线。

当时，还有片面媾和与全面媾和之争。革新力量主张全面媾和论，反对军备，坚持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实现全面媾和。1948年，50多位学者联合发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日本科学者的声明”；1949年3月，成立“和平问题谈话会”，就日本独立后与美结盟还是中立问题展开讨论，坚决主张“中立政策”。在政界，社会党、共产党主张全面媾和。媒体方面，《朝日新闻》支持全面媾和。日本劳动工会总评会议、日教组等也支持全面媾和。但是，当时占上风的仍是保守力量推行的片面媾和。旧金山体制、日美安保体制、《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日美行政协定》都是其结果。

三、“旧金山会议”与“旧金山和约”

（一）“旧金山和约”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解决在日占领的压力，美国迫切地希望从法理上解除对日战争状态。1951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召开，52个国家参加，49个国家于9月8日签署《对日和平条约》。该条约于1952年4月28日生效。其内容包括：

1. 日本承认朝鲜独立；
2. 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放弃对南太平洋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
3. 日本同意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而以美国为惟一管理当局；
4. 日本不得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盟国可同日本缔结双边协定，在日驻军；
5. 盟军承认日本领土领海的主权，实质上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会议。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条约上签字，它们认为该条约对日本过于宽容。

在该条约签订后，日美签订《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美军可以继续在日本驻扎，因此美军实际上并未从日本撤出。

（二）日华和平条约

1. 《日华和平条约》签订

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中国没有代表参加。日本独立后，面临选择大陆还是台湾建立外交的问题。美国方面希望积极地推行反共政策，因此主张日本同台湾当局建交；但日本首相吉田茂作为务实派，希望效仿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陆更大的市场产生贸易往来，也有利于恢复日本经济。

早日签订对日和约，使日本恢复主权，加入自由世界，共同反共。

——约翰·杜勒斯

无论中国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中国是天然的市场，日本必须考虑市场问题。

——吉田茂

不管意识形态如何，要从现实外交角度自主决定。现在的对华关系要从通商上考虑，看对方态度而定。日本认为，也可以在上海设立驻外办事处。

——吉田茂

对于意见的分歧，杜勒斯向吉田茂施加压力，要求其必须选择台湾当局，否则就使美国参议院不通过《对日和平条约》，日本就难以恢复主权。最终，吉田茂向杜勒斯递交“吉田书简”，保证与台湾当局缔结建立正常关系的条约。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德报怨”，广播讲话《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1950年，《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签订；台湾当局所谓“中华民国”还占领着联合国的席位；基于上述背景，日本选择与台湾当局建立“外交关系”，于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当日）签订了《日华和平条约》。

《日华和平条约》的基本内容有：

1. 结束日本与“中华民国”之间的战争状态；
2. 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
3. 1941年12月9日前中日两国缔结的所有条约、协定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
4. 尽早缔结贸易、航空航运、渔业等协定。

2. 赔偿问题

战争赔偿一般分为两种：

* **一般赔偿：**对战争受害者进行的金钱、实物赔偿；
* **劳务赔偿：**对受害者提供修缮、人员和技术合作。

台湾当局的立场是：“如果日本对其他国家支付赔偿的话，中国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急于与日本建立关系的台湾当局放弃了战争赔偿。

（三）新中国的对日政策

在《日华和平条约》签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这一条约是无效的。台湾当局不能代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当时，中国的对日政策有：

1. 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基础，共同对日缔结和平条约，反对美国的片面媾和，反对《对日和平条约》；
2. 反对美国对日本的长期占领，反对日本再军备；
3. 反对日本政府与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缔结和平条约；
4. 对日本人民与实施了错误政策的日本政府区别对待，支持日本人民的独立、和平与中日友好（两分法）；
5. 中国以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为基础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发展贸易关系，反对日美两国的封锁与禁运。

第三讲 从政党林立到“55年体制”的确立

2025.3.13

一、日本政党政治历史

（一）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党政治

1. 日本政党政治的产生

明治政府的建立受到了诸多元老的支持。在政府建立后，这些元老分为了两派，一派主张对亚洲大陆扩张，建立“大日本帝国”，即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提出的“征韩论”（1870年）；另一派则主张先聚焦于内政治理，即苍岩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提出的“内治论”。“内治论”一时占了上风。

1873年，明治六年政变发生，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退出政坛；为了对抗当时的政府，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人开始发动自由民权运动，于1874年建立了“爱国公党”，发表了《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要求建立国会、颁布宪法；后来这个政党改名为“自由党”。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发生，有影响力的贵族大隈重信被免去参议员，此后他也开始参与自由民权运动，建立了“立宪改进党”。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与呼吁之下，天皇宣布，将于1889年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国会。

1898年，第一届政党内阁——“隈板内阁”成立，大隈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板垣任内务大臣，但仅存5个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权力主要还是把握在天皇和枢密院手中。1900年，伊藤博文组建“立宪政友会”，虽形式上是政党，但实际上是天皇的附庸，这个政党也在之后与另两党的竞争中获得了日本国会的最多席位；1909年，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杀。一战后，日本政党政治获得长足进展。1919年，政党内阁原敬内阁设立，原敬成为明治时代第一位“平民首相”；1921年，原敬在东京车站遭到暗杀。

总之，虽然日本的政党政治在明知时代发源，但政党政治是十分脆弱的。当时内阁的阁员大多来自长洲、萨摩二藩，普遍较为年轻，他们都是被天皇所任命的，并没有实权。

2. 《明治宪法》

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颁布，其特点是“钦定宪法”“天皇主权”。天皇是集行政、司法、立法、军事统帅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另一个特点是“双重政治结构”，即宪法之外的《皇室典范》：虽然有选举之政府（如众议院、政党内阁），但还有非选举之政府（如元老、枢密院、军部〔军权独立，由现役军人担任〕）。总之：

1. 国家主权属于天皇，内阁、议会、法院是天皇的辅助机构；
2. 内阁由天皇任命的大臣组成，并对天皇负责；
3. 议会只是政府提出的预算案、或法律草案的审议决定机关，在军队统帅、文武官员的任免、条约缔结等方面毫无权力。

（二）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政党政治

30年代后，日本进入了军国主义时代。40年代后，进入战时体制，政党被解散，成立“大政翼赞会”。1942年，改为“翼政政治会”，466名议员中458名参加了“翼政政治会”。

（三）战后的日本政党政治

二战结束后，御用政治团体相继解散，新的政党纷纷建立，其中有五个影响力较大的政党：

* **社会党：**1945年11月2日成立，由战前三个政党成员组成：社会民主党（西尾末广、片山哲）、日本劳农党（浅沼稻次郎、河野实）、日本无产党（加藤勘十、铃木茂三郎）。在光谱上位于左翼，属于革新力量。其党纲主张“劳动阶级的联合体，确保国民自由，建立民主体制；排除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军国主义思想及行动；实现持久和平。”总之，其基本纲领是政治上确立民主主义体制；经济上推行社会主义；对外奉行和平政策。
* **自由党：**成立于1945年11月9日，以原政友会鸠山一郎为中心组成，联合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学者、评论家、财界人物，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光谱上属于资产阶级保守政党。1946年战后第一次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其基本纲领是：杜绝军国主义，按照世界公理，建设新日本；维持国体，建立民主、负责任的政治体制；促进自由的经济活动，再建农工商各产业；尊重人权，高扬社会和政治道德；尊重人权，提高妇女地位，以期社会稳定、幸福。
* **进步党：**成立于1945年11月16日。以原民政党和政友会的一些派别为中坚而形成的，是战时“大日本政治会”的转型。在光谱上属于资产阶级保守政党。其基本纲领是：拥护国体，推行民主主义，确立以议会为中心的责任政治；尊重个人自由，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调整产业，发展生产，公正分配，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 **共产党：**1922年7月成立，战前被作为非法政党受到镇压。1945年12月1日恢复，召开了时隔19年的第四届代表大会，德田球一被选举为党首。1946年2月第五届党代会提出“和平革命论”。在光谱上属于激进左翼。政党目标是：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惩治一切战争罪犯；废除旧宪法和旧议会，实现民主主义革命。
* **协同党：**成立于1945年12月18日。主张劳资协调，保守偏左。成员大都曾是大政翼赞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后来加入反东条内阁运动。其基本纲领是：维持皇统；确立民主政治体制；打破包括资本垄断在内的全部封建因素；推行以勤劳、自主、相爱为基调的协同主义。

二、“55年体制”的形成与崩溃

（一）整肃

1945年12月18日，众议院被解散；1946年1月占领当局发布第一次解除公职备忘录，对进步党冲击最大，274名议员只有14名能参加大选；自由党13名能参加；协同党只有2名。1946年战后首次大选（明治宪法最后一次大选）后，466名议员中381名为新议员：自由党140人、进步党94人、社会党93人、协同党14人、共产党5人，新人占81.8%。

自由党作为第一大党，鸠山一郎本可以组阁，但占领当局认为鸠山有战争嫌疑，被解除公职。吉田茂代替鸠山成为自由党党首，并联合进步党组成第一届吉田内阁。当时，鸠山一郎与吉田茂达成了“鸠山-吉田密约”——吉田提出三个条件：不负责筹集党的资金；不允许干涉内阁人事安排；不想干时可以随时辞职。鸠山一郎同意，并补充了一个条件：整肃结束后若自己重返政坛，则吉田茂要把自由党总裁之位让回来。

（二）社会党与自民党

1947年大选，参众两院社会党均为第一大党，众院的选举结果是：社会党143席、自由党131席、民主党126席、国民协同党31席、共产党4席。社会党联合民主党、国民协同组成联合政权，片山哲为首相，芦田均为外相，但因政策失误仅维持8个月就被迫辞职，继任的芦田均（民主党总裁）也因“昭和电工案件”而很快下台。

此时，社会党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围绕媾和问题，社会党分裂为左派和右派社会党，就支持还是反对“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问题产裂。1949年大选，社会党的议席从143跌到48席。1955年大选中，社会党左右两派在众议院达到156席，再次成为第一大党。

可见，从1947年到1955年，日本的政党政治较为混乱，多数时候是保守力量占上风，有时也有左翼力量占优。但是，随着50年代冷战局势的加剧，日本财团与美国都不希望看到社会党上台，因此扶持自民党就成为了必然。

50年代后，保守党发生混乱，自由党因鸠山一郎重返政界与吉田斗争激烈（吉田茂没有按密约约定将总裁之位让给鸠山一郎），自由党分裂为140名的吉田派和119名的鸠山派。1954年鸠山派成立民主党，拥有121个众院席位。由于社会党的合并，大财团坚决要求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结果于1955年11月两党合并为自民党。从此，日本政党政治进入以保守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以社会党为主要在野党的政治格局，即“55年体制”直至1993年自民党下台。

（三）“55年体制”的特征

55年体制的特征有：

1. 形式上自民党、社会党等“多党制”，实质上自民党占绝对优势的“一党优位制”，“一党独大制”；
2. 政府决策过程被自民党、官僚、财界所控制，所谓“官政财”三位一体的决策机制；
3. 政府权力的更换由战后初期的多党轮流执政转变为自民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更迭，即自民党内派别之争代替了国会的多党之争；
4. 政府决策过程排除社会党、共产党势力，但社会党、共产党势力转向地方自治体，争取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

（四）“55年体制”的崩溃

1993年，自民党为平息金权政治丑闻而宣布“彻底改革”，导致部分党员退党成立“先驱新党”“新生党”等。自民党在1993年7月大选中未过半数以上席位，成立了由细川护熙为首相的8党联合政权，小泽一郎在幕后操控。1994年6月，自民党与社会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担任首相。社会党为此修改党章，承认自卫队合法合宪，默认日美安保条约和驻日美军的存在，开始保守化，希望效仿美国形成“两个保守政党轮流执政”。

阪神大地震后，村山内阁被指应对不力，被迫辞职下台。1996年1月，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组阁任首相，恢复执政地位；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执政5年多。2009年，民主党上台执政；民主党是从社会党和自民党中分裂出来的，与保守化的社会党一样，希望形成“两个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民主党执政直到2012年，其执政期间中日、日美关系恶化，因而下台。2012年，自民党安倍晋三上台，执政七年多；日本政党界自民党一党独大、党内安倍独大的态势长期保持；2020年，安倍晋三辞职，此后的两届大选中自民党表现尚可。2022年，安倍晋三被刺杀。在2024年大选中，自民党席位未过半数，其基盘显出脆弱形态。自民党直至现在仍在执政。

第四讲 “反吉田路线”的鸠山一郎内阁与岸信介内阁

2025.3.20

吉田茂属于自民党内部的保守本流，而鸠山一郎与岸信介则是保守本流中的保守派，他们奉行的是“反吉田路线”。

一、“鸠山热”与日苏邦交正常化

（一）“鸠山热”

1951年，鸠山一郎重返政界。由于吉田茂与鸠山一郎的矛盾，鸠山另立民主党，联合社会党反对吉田路线。1954年12月，民主党组成内阁。

鸠山一郎的民主党之所以能够上台，一方面是因为1953年至1954年日本没有了战争特需，经济陷入萧条，鸠山一郎承诺将打开社会主义阵营的市场，恢复经济；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美国在日本扩张军备、扩建机场，引得民众不满，又有第五福龙号事件（日本渔民在比基尼岛附近捕鱼时遭受了美国核试验导致的辐射），因此日本国内反美情绪高涨。此时，鸠山一郎提出了大众政治、国民外交、修改宪法、自主防卫的主张，与官僚政治、秘密外交、轻武装、向美一边倒的吉田路线针锋相对，鸠山一郎一时有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家”的形象，在日本民间形成了“鸠山热”。

（二）日苏邦交正常化

鸠山一郎执政期间，尽快回归国际社会是主要课题。当时，日本迫切希望加入联合国，重返国际社会，但是由于日苏还有尚未解决的矛盾，因此每次都被苏联一票否决。因此，鸠山一郎开始将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作为目的。日本要与苏联解决的矛盾有：

1. 解救被俘日本人（被俘者：日方数据：57.5万人，至1948年送还47.1万，被扣留尚有10万。苏方数据：已经送还510409人，尚在服役的1487人，因病接受治疗者9人）；
2. 解决北太平洋渔业权问题（被扣日本渔船559艘，渔民2311人）；
3. 日本扩大国际经贸的需要；
4. 解决北方四岛问题。

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外交方向也有重大转变，赫鲁晓夫开始尝试与西方“和平共处”，希望通过与日本建立正常关系以在苏美之间建立缓冲地带。苏联与日本的谈判的主要阻碍是北方四岛问题。

北方四岛指的是北海道东北部的齿舞群岛、色丹岛、国后岛、择捉岛。苏联占领北方四岛的依据是

1. 《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对南库页岛（日称桦太）与千岛群岛的占有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目的之一；1945年9月，苏联占领了北方四岛；1946年，苏联将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编入苏联版图；
2. 《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及库页岛一部分及附近的一切权利。

日本要求收回北方四岛的依据则是：

1. 《雅尔塔协定》是秘密协定，日本没有参加，日本不受其约束；
2. 北方四岛不属于千岛群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是通过战争获得的；
3. 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中，沙俄承认朝鲜为日本“保护国”，获得旅顺、大连租界权，并将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永远让予日本。

在谈判中，日苏双方就此问题相持不下。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在其中做了许多努力，最终苏联作出了妥协，表示可以在和平条约签订后归还齿舞群岛和色丹岛，但对国后岛和择捉岛寸步不让。对于这一条件，鸠山内阁较为认可，但日本民众与美国都反对这一决定。在多方压力下，鸠山一郎最终仍决定答应苏联的条件，但日苏两国一直没有签订和平条约（因为一旦签署，相当于承认苏联对国后岛和择捉岛的占有），直到今天日俄之间也没有签订和平条约。

1956年10月19日，日苏签署《日苏联合宣言》，主要内容有：

1. 结束战争状态，建立和平友好的善邻关系；
2. 互派大使级外交使节；
3. 遵循《联合国宪章》，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4. 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
5. 苏联释放并遣返被拘留的战前俘虏，并继续调查失踪人员；
6. 苏联放弃战争赔偿要求；
7. 尽早进行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
8. 已签订的《渔业协定》与《联合宣言》同时生效；
9. 苏联同意将齿舞、色丹移交给日本，但只能在和约签订后进行。

从《联合宣言》看，鸠山一郎的许多诉求都得到了满足；苏联也通过《联合宣言》在战略上实现了一些目的，改善了商贸环境。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废除了《联合宣言》，要求美军撤出日本。

无论如何，对于1956年的日本而言，《联合宣言》是一个重大胜利，鸠山一郎内阁在外交上开拓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天地，后来也与中国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这在当时受美国制约颇多的日本外交下是难能可贵的。

二、岸信介的强权政治与外交

（一）岸信介的外交主张

1956年12月，自民党左翼的石桥湛山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但不久后即因病辞职，由时任外相的岸信介任新首相。

岸信介的主张有：

1. 摆脱占领体制，建立独立的国家体制，修改宪法、重新军备；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实行自主防卫；
2. 1957年日本发表外交三原则：联合国外交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

（二）赔偿外交与积极的东南亚外交

岸信介作为一个大亚洲主义者，主张进行亚洲外交，由赔偿外交转变为经济外交。1951年签署的《对日和平条约》第14条规定“日本承认在战争中给他国造成的损失与苦难，承认进行赔偿义务”，但又规定赔偿的前提条件：

1. 领土被日本占领作为限制条件，苏、英、法、加、澳等国被排除；
2. 未规定赔偿数额和起止期限，使日本掌握主动；
3. 支付形式限定劳务赔偿。

根据这一条，东南亚有四个国家自1952年起开始催促日本履行赔偿义务，认为日本的战争赔偿是解决与日本关系的前提条件。

* **印度尼西亚：**175亿美元（172亿），结果1958年签订协议，2.23亿美元产品和劳务（12年），4亿美元经济合作贷款，日本放弃1.769亿美元债务；
* **菲律宾：**80亿美元，结果1953年签订打捞赔偿协定，1956年签订赔偿协定：5.5亿美元产品（20年）和劳务，2.5亿美元贷款；
* **缅甸：**1954年签署，2亿美元赔偿，5000万美元建合资企业；
* **南越：**20亿美元要求，结果1959年签订协议，3900万美元产品服务，1700万美元贷款；1973年日本与北越建交，无偿提供85亿日元经济援助。

实际上，日本政府将赔偿作为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一步棋。岸信介指出，东南亚外交可以拓展市场，“把印尼、马来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变成一个中型的帝国主义”。对美国，岸信介则将其解释为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效劳，遏制共产主义向东南亚扩张。此外，由于日本与中国台湾当局所谓“建交”，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一度断裂，岸信介希望以东南亚替代失去的中国市场。

岸信介积极的东南亚外交的具体举措有：

1. **赔偿外交：**将解决赔偿问题看成日本重返东南亚的台阶。日本先后与菲律宾、印尼、南越等签署了赔偿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
2. **“东南亚开发基金设想”：**利用“美国的资金、日本的技术、东南”亚的资源联合开发东南亚构想”。虽然这一设想在当时并未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后来在佐藤荣作执政时期得以实现。

（三）反共亲蒋的对华政策

岸信介是战后第一个作为日本首相访问台湾的人，他秉持反共意识形态，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

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对日本的渗透，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收复大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岸信介

在岸信介访问台湾后，中国外交部对此严厉谴责，中日关系迅速恶化。鸠山内阁和石桥内阁时期，中日民间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但岸上台后破坏了第四次民间贸易的谈判和执行，本来迅速发展的民间交流也被迫中止。

在岸信介执政时期，还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1958年，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举办了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悬挂着五星红旗。有两名日本人撕毁了中国国旗，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但岸政府对那两个日本人的行为进行辩护。

（四）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日美安保条约》是在吉田茂内阁时期签订的，其中有许多不规范的表述，如没有规定期限、美军可在日本镇暴、没有规定美国对日本的保护义务等。因此，在鸠山一郎内阁时期，重光葵就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商议修改条约，但杜勒斯以日本没有军事力量拒绝。

岸信介上台后，开始重整防卫力量，以此为前提开始推进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7年6月14日，通过了战后第一个长期防卫计划《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划陆上自卫队要达到18万人，海上自卫队舰艇吨位要达到12.4万吨，航空自卫队飞机达到1300架等。在提出此计划后，1958年起，岸信介内阁开始与美方谈判；当时，日本政界的革新派（如社会党）对修订条约、摆脱美国控制呼声很高，民间反美情绪更是高涨，美国面对这些压力也不得不有所妥协。1960年1月19日，日美签订了《日本与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不平等内容得到初步修正：

1. 明确规定了该条约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从属于联合国宪章）；
2. 明确规定了美国对日本防卫的义务；
3. 事先协商制度：明确规定驻日美军的配备、重要装备的变更、使用日本设施和区域时，须事先与日本政府协商；
4. 删除了“内乱条款”；
5. 有效期为10年，10年后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终止该条约。

但是，《日美安保条约》的实质精神却基本没有改变；并且，其中还有一个“远东条款”，声称要保卫远东和平，这就使这一条约不再只是一个双边条约，而是一个多边条约。

**第六条** 为促进日本安全、维持国际和平与远东安全，美国获准使用在日本的陆海空军事设施与用地。使用上述陆海空军事设施与用地及驻日美军应以另一协议约束。有关协议取代按照日本与美国在1952年2月28日于东京签署安全保障条约第三条下行政协议。

——《日本与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

在左翼政党的质询下，岸信介声称“远东”指的是关岛-日本-朝鲜-台湾-菲律宾（“第一岛链”）之内的地域。这就导致，如果将来在台海或朝鲜再发生冲突，日本就势必会被卷入美国的战争，这与当时日本强烈的反战思潮背道而驰。为了通过《日美安保条约》，岸信介出动警察，阻止反对通过条约的议员进入国会，最终强行通过了《日本安保条约》；这一行为显示出岸信介的专断，舆论甚至认为这是回到了战前。因此，日本国内的“反安保”运动高涨，民众发动大量游行示威，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迫于日本国内的反美、反岸信介浪潮，岸信介内阁被迫取消了艾森豪威尔原定的访日行程，艾森豪威尔派来的特使也被日本民众围在机场，最后是被美军直升机营救了出去。最终，岸信介辞职下台。

日本政坛的传承较为突出。例如，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是日本第90、96-98任内阁总理大臣，外孙岸信夫曾任防卫大臣；鸠山一郎的孙子鸠山由纪夫是日本第93任内阁总理大臣；吉田茂的外孙麻生太郎则是自民党内部的大佬。

第五讲 池田内阁与佐藤内阁的政治与外交

2025.3.27

第六讲 七十年代的日本外交

2025.4.3 / 2025.4.10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

（一）中日民间外交

战后中日关系的起点是冷战格局、旧金山体制、日华和平条约。

1952年至1972年是民间外交时期。中国方面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发展国际统一战线。中国秉持二分法，将日本人民与日本政府相区别，团结日本人民，对日本政府的反华政策作斗争。在这一时期，中日的民间交流、政党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

日本政府对华主张政经分离，政治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与华外交关系，但是还是推动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但是，政治上的敌视会导致经济交流的失败，政经分离的理念在岸信介内阁、佐藤荣作内阁时期难以执行，因此中国政府在60年代提出政经不可分原则，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停止反华言论；停止制造两个中国；不阻挠关系正常化进程。

日本民间存在亲中国力量。经济界认为日本经济发展需要与中国合作；也有一些民间友好人士认为中日传统文化相近，因此偏好与中国交流。日本的一些在野党从政治立场上则希望走非武装中立道路，与中国共同反美。1952年，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署。1954年，鸠山内阁时期，民间往来扩大。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1. 中日复交三原则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公明党、社会党等在野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与周恩来多次交流，记录的“竹入笔记”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奠定了基础。

中国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
2.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
3. 日华和平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此外，双方还有“不公开的三原则”（默契）：

1. 中国默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2. 中国放弃战争赔偿——一方面延续“二分法”不给日本人民造成压力，另一方面减轻田中角荣面对的日本国内压力；
3. 不涉及钓鱼岛问题——不久之前联合国方面在钓鱼岛附近勘探出了大量油气资源，中、日、台湾当局都对此抱有想法；为防止领土谈判长期拖延，故搁置领土争端。

2. 中国的战略考虑

之所以在当时推进中日复交，中国是具有战略考虑的。第一，当时中苏关系极其紧张，珍宝岛事件已经发生，基于对抗苏联的考虑，中国希望与日本复交；第二，孤立台湾，如果能在日本这个亚洲的重要国家上有所突破，则孤立的效果会更显著；第三，促进经济合作，日本在当时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中日在经济合作上是可以深化合作的。

3. 谈判过程中的难点

在中日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难点。

* 1. 中日复交起初的表述是“战争状态结束”，但是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认为，《日华和平条约》中已经宣布了中日战争状态结束，因此将其修改为“不正常状态结束”。此事后来被周恩来谴责。
  2. 日台断交以口头形式宣布。因为《日华和平条约》是被日本国会通过的，如果将日台断交写入新的文件，那么就具有了法律的性质，回到日本后需要被国会通过，可能导致田中角荣的下台。因此，1972年9月29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后，大平正芳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失去继续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台湾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将不能维持。”
  3. 日方对历史问题的表述。大平正芳在来华后的晚宴上，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表述为“麻烦”，中方认为这一表述过轻。因此，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方对历史问题的表述是：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中日联合声明》

当然，为了尽快达成复交，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并没有对战争的定性，也没有道歉；但是，这仍然是日本政府首次对侵华战争作出了正式表态。

（三）《中日联合声明》

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主要内容有：

1. 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2. 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中：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士部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这个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4. 中日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尽快互换大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6. 两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7. 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合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8. 两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9. 两国政府为了发展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空、航海、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二、尼克松冲击与自主外交的提出

（一）尼克松冲击

1965年，日本对美贸易出现黑字，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的压力日增。1969年1月，尼克松发表讲话，要求日本对毛织品、化纤产品的对美出口实行自主规制。日美贸易摩擦激化。之后，美国宣布“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迫使日元升值17%，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美国的越顶外交也让日本不满。1970年10月，日美首脑会谈时，约定在对华政策上要紧密协商，但佐藤政权仅在8分钟前才得知尼克松访华的消息——日本被“出卖”了。内外交困的佐藤于1972年6月宣布辞职。

尼克松冲击与自主外交的提出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背景。中国当时已开始回归国际社会：1970年10月，中国与加拿大建交；11月与意大利建交；1971年11月回归联合国。

（二）田中内阁的“自主外交”

1. “自主外交”概述

美国的衰退促使日本推行独立自主外交。

我们曾经把基本方针放在与美国协调上，极力避免参加国际政治活动，然而美元地位的下降，迫使我们走自主外交的艰苦道路。

——大平正芳

田中内阁“自主外交”的基本特征是以不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为前提，通过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来体现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并把亚洲作为日本外交新领域的重点地区。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的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由此，日本也开始了对中东的能源外交。

田中角荣下台的主要缘由是洛克希德案，他担任首相期间（1972~1974），收受5亿日元贿赂，促成全日空采购洛克希德飞机。1976年，田中角荣被捕；1983年，一审判决4年徒刑，罚款5亿日元，田中不服上诉；1987年，上诉被驳回，田中再次提起二审上诉；1995年最高法院再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田中已于1993年病逝。

虽然经历丑闻而下台，但田中角荣在自民党内部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就有赖于日本的“金权政治”：战前财阀介入军事工业，与军部联合；战后与政治家勾结，为政治家提供资金，政治家给财阀提供政策便利和好处。

2. “自主外交”的具体内容

尼克松上台后，开始推行“尼克松主义”，国际体系从“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变为“责任分担的和平”，这为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追求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客观条件。

1973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对大豆等农产品实施全面出口禁运以应对粮食减产、国内通货膨胀问题，使大豆自给率仅有3%的日本深受“大豆冲击”的影响。

1973年至1979年间两次中东石油危机后，日本意识到非军事性的威胁来源进一步增多，消极依靠美国的保护无法满足其多重安全需求。日本被阿拉伯产油国划入限制石油供应的“非友好国家”中，这给当时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达88%的日本带来了极大的社会不安与经济混乱。

1973年5月，通产省大臣中曾根康弘访问了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四国——日本从这四国石油进口量占比超70%。从此，日本的中东外交从亲以色列转向亲阿拉伯，以援助、投资、贸易加强与阿拉伯各国关系，直接参与能源开发来确保石油的稳定供应——“开发进口”。

三、福田内阁的全方位外交

（一）福田内阁的东南亚外交

日本对东南亚“赔偿外交”开展后，大量日本企业、日本商品来到东南亚，本地企业大量倒闭破产；同时，日本本土开始重视环保，大量高排放产业从日本迁移到东南亚，破坏了东南亚各国的环境；因此，东南亚的反日思想开始积累。1974年，田中角荣访问东盟，遭到反日浪潮。

福田内阁上台后，提出了“全方位外交”。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访问东南亚，发表了《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说，即是“福田主义”，其核心内容如下：

1. 日本决心奉行彻底的和平政策，不做军事大国；
2. 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不仅要在经济、政治方面，而且要在社会、文化等广泛的领域内建立起“心心相印”的信赖关系；
3. 日本要站在“对等合作者”的立场，给予积极合作。

福田内阁提出了“ODA五年倍增计划”：以1977年的14.24亿美元为基准，争取到1980年对外援助总额翻一番；1979年对华ODA六个项目中就有四项是输煤铁路或港口的建设。

（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自1972年开始酝酿，但直到1978年才签订。其中的障碍有：第一，苏联反对条约中的“霸权条款”，称日本若接受“霸权条款”就是在针对苏联；第二，自民党内反华亲台势力的阻挠；第三，中国政局的动荡。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推动力量，如苏联的扩张政策、日本财界的战略、福田作为鹰派的有利条件等。其中，日本财界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石油危机后，日本财界开始推行石油资源多元化，因而它们希望与中国展开石油贸易。

1978年8月12日，中日在北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主要内容有：

1.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2.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
3. 按照平等互利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与文化关系。
4.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的关系。
5. 本条约有效期10年，双方宣布终止之前继续有效；缔约任何一方在10年期满时可以书面提出终止本条约。

10月23日，邓小平访日。1979年日本开始向中国提供ODA援助（包括无偿援助、技术援助、90%低息贷款等）。日本对华ODA援助可被看作是一种战后补偿的替代形式：日本有其经济战略需要（市场准入、稳定回报、资源获取）；中国则受益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

四、一亿中流意识及其产生背景

（一）一亿中流意识的产生背景

1. “日本热”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社会发生全面转型，国际社会出现了“日本热”现象。1979年傅高义写作的《日本世界第一》风靡全球。此时的日本，相较战败之初，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新的体制。

* **政治领域：**由天皇制转变为以天皇为象征的议会内阁制，建立和巩固了以“和平宪法”为核心的法制体系，确定了“经济立国”的和平发展路线。
* **经济领域：**“战时统制经济”转向“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确立了以“行政指导”为显著特征的日本型竞争体系，构筑起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
* **外交领域：**以日美关系为基轴，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的外交体系，辅之以包括“亚洲一员”“西方一员”“联合国外交”为内容的“外交三原则”，同时在周边外交、资源外交、援助外交中追求“日美对等化”与“全方位外交”。
* **文化领域：**以和平主义思潮为主流，以“保革对立”为结构特征的社会意识结构酿成了“忠于公司”为支柱的社会价值体系。

2. 70年代后的新现象

70年代后，“保革对立”弱化，从激烈的对抗转向协调关系，表现在“总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春斗转向（转向劳资协调）。日本社会也开始“泛保守化”，据日本内阁府的抽样调查显示，1976年有90%的国民对现有生活保有满足感，这种现象被称为“一亿中流”。这种中流意识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满意，也是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心理。

（二）一亿中流意识

1. 一亿中流意识的具体表现

一亿中流意识的具体表现包括：

1. **对保守政党及其政权的支持：**70年代中期后，自民党的支持率上升，革新自治体的地盘被自民党等保守势力夺回；
2. **对“日美安保条约”和“自卫队”持肯定态度：**所谓“日美安保效用”论被大众接受；
3. **民族优越感增强：**认为日本是先进国家（1975年日本加入西方7国首脑会议），日本国民比其他国民更优秀，生在日本是件好事。

2. 一亿中流意识的消极面

一亿中流意识的保守化带来了一些消极面：

1. **志向于生活，对政治漠不关心：**大众沉湎于经济高速增长与大量消费中，对政治没有热情，成为“企业战士”。1979年3月，欧共体事务局提交的报告《对日经济报告书》认为“日本是住在兔子窝那样环境中的工作中毒者的国家”。
2. **左翼右翼严重分化：**极右方面，1970年，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剖腹自杀具有象征意义——是对战后沉湎于经济生活，丧失独立人格和政治热情的反叛。极左方面，1970年，日本赤军派策划了淀号劫机事件，要求飞往朝鲜。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民族主义的反思的意见。西部迈在《大众的病理——走进死胡同的战后日本》中认为“大众的愚昧”“愚民”时代到来，目标应该重建国民的道德。江藤淳在《46年宪法的束缚》中认为和平宪法使日本国家丧失的独立国格。清水几太郎在《核选择——日本要成为国家》中提出日本要拥核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1. **政治腐败：**“官政财铁三角”关系——如1974年田中角荣涉嫌“洛克希德案”，1976年被捕。

第七讲 八十年代的日本外交

2025.4.10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外交战略的调整

70年代末，美苏新冷战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战略选择是：

1. 在困境中与美国“同甘共苦”，与美国进行分担责任（美国的过度衰弱对日本不利）；
2. 双轨战略：加强日美同盟，以与美国合作为轴心；提高日本的自主能力和国际领导能力；
3. 强调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合作，超越双边关系范畴；具体行动如对巴基斯坦、泰国及其周边国家提供战略援助。

（一）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要依靠经济、文化、社会稳定等综合力量来保障。日本与世界的依存度加深，面临威胁的种类多样化，保障安全的手段也应该是多样的。

80年代的最大问题是，在新的美苏对立背景下，美国与西欧、日本的同盟关系重新调整，其原因在于日本和欧洲的利益已经名副其实地扩及全球，但保护其利益的手段与能力仍十分有限，因而离开美国无力单独维护地区安全。

——永井阳之助

（二）中曾根主义

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他认为，“日本正处在战后的重大转折时期，要毫无顾忌地以新的眼光重新认识过去的基本制度和结构”，“要纠正战后40年的弊端”，“消除战败遗迹”，创造一个辉煌的“日本世纪”。

中曾根康弘也提出了“政治大国”的目标，指出“要在世界政治中提高日本的发言权，增加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是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

安全领域，要求分担美国的责任。1978年，日美两国制定“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调“日本有事”的联合作战，加强联合军事演习；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 （1976年三木内阁）。1987年，防卫费超过这一限额，达到1.004%；日本开始承担1000海里海上通道的防卫任务（关岛→东京、台湾海峡→大阪的航线）；

中曾根内阁推行文化教育改革，1984年设立文化教育恳谈会，强调继承日本传统文化，培养爱国心；设立国际日本文化中心，向世界传播日本文化，确立日本文化大国的地位。

中曾根时期，智库作用提升。高坂正尧成立“和平问题研究会”，深入研究日本的发展战略。日本的智库认为，世界已进入“多边管理时代”，这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前提； “两根时代”（里根-中曾根）为建立西方安全体制进行合作，为世界经济重新获得活力而作出贡献，为协调南北关系承担义务。

（三）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为了实现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日本加强了亚洲外交力度。1981年，日本对外援助的71%在亚洲国家.（对华提供ODA是其中之一）。1980年5月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最后报告确定了目标：20年后建立“太平洋共同体”。1981年开始，太平洋合作会议（PECC）每年召开。1982年6月，铃木首相发表“大平洋时代的来临”演说。

1985年1月，中曾根访问澳大利亚，提出四项原则：

1. 尊重东盟国家的主动精神，以东盟为主导进行合作；
2. 促进民间机构的主动精神，以民间为主导进行合作；
3. 否定太平洋合作的军事，政治性质，只进行经济，文化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4. 合作体制是开放型的，不是排他性的。

二、八十年代日本对华外交

大平正芳内阁促进对华合作，提高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决定对华提供ODA援助；提出对华经济合作三原则：

1. 与欧美等国相协调；
2. 不牺牲亚洲各国特别是东盟各国的合作关系；
3. 不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

中曾根内阁右靠美国，左靠中国，稳住东盟和韩国，以确保对苏外交的有利地位。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的特点是：

1. 推行经济战略，以经济合作作为发展日中关系的基础。中苏关系不战不和，长期对立对日本有利；
2. 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对日本发展有利；
3. 日美同盟与日中友好是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借助日中友好提高与美国打交道的地位；
4. 日中关系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很大；
5. 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将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我国一百多年的政治经常与中国具有很深的关系。日本政治根子上的问题总不断地是中国问题，即使说撇开中国问题便难以考虑日本政治也不过分。

——田中角荣

第八讲 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与突破

2025.4.17

一、冷战时期：专守防卫

专守防卫，即遭受敌方攻击时才能使用自卫队进行防御，不主动发动攻击或使用进攻性武器。专守防卫意味着被动防御、最小必要武器、无攻击性武器。

对于专守防卫，日本在冷战时期制定了一些原则。1967年，出台了武器出口三原则：不向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出售武器；不向联合国禁止的国家出口武器；不向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或者可能要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出售武器。2006年，小泉内阁决定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利用ODA向印尼提供 3艘武装巡逻艇，协助打击海盗和保护马六甲海峡运输安全。2014年，安倍内阁改名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放宽出口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条件。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于1967年提出的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即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于1971年由众议院通过。

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时期，有规定防卫支出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

1976年，首部《防卫计划大纲》中提出发展“有节制和高质量的基础防卫力量”，以提升作战能力，实现部队精干化、效率化为基本前提。

二、冷战后：尝试突破专守防卫

（一）90年代：应对朝核问题和台湾海峡危机

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方面希望日本派出自卫队进行后勤支援工作，但日方认为这有违自卫队不驻海外的原则，故仅进行了经济上的支持。海湾战争后，日本受到了多方批评，如美国批评日本行动迟缓、经济支援力度不足，科威特感谢各国支持时没有提及日本。日本的一批政治家以此事为契机，开始推动“日本能否在海外派兵”问题的讨论。

1992年“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PKO合作法）允许自卫队派遣到海外，让自卫队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形式做出“国际安全贡献”，推动自卫队在联合国框架内走出国门。

1995年出台了《防卫计划大纲》，相比“76大纲”，更强调保持合理、精干、高效的可靠防卫力量；充实和加强日美安全体制；协助美国应对周边事态。

1999年《周边事态法》首次主动规划自己的系统性地区安全政策，通过加大对周边的投入确保自己的安全。日本的防卫之所以在此时取得了突破，就在于朝核问题与第三次台海危机。但是，“周边”的概念也招致了日本地理周边国家的质疑，而日本排除了“周边”的地理解释，认为只要事件对日本和平有影响，就属于“周边”事态。

（二）21世纪：配合美国反恐

以反恐为契机，日本的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2001年，日本跟随美国出台了《反恐特别措施法》，有效期2年，至2007年结束。2003年，出台“有事三法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2004年的《防卫计划大纲》明确提出将国际贡献与本土防卫并列为自卫队的主体任务，日本自卫队开始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如维和行动等。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着眼于应对中国的防卫，否定了构筑“基础防卫力”的方针，转为强化“机动防卫力”的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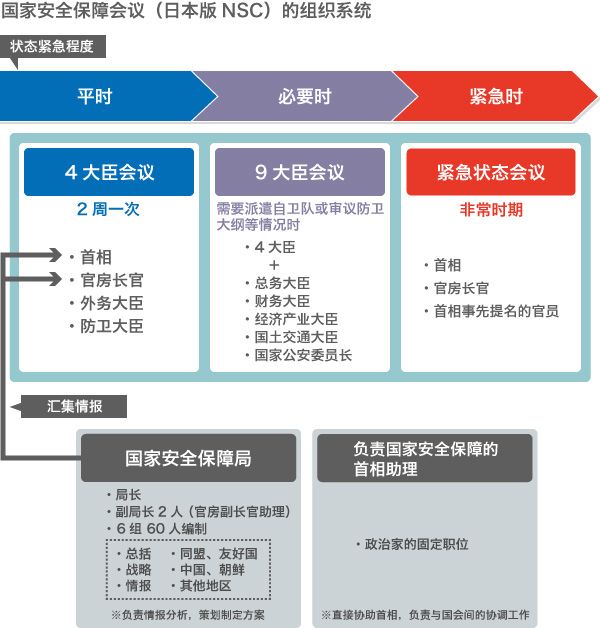
三、安倍第二次上任后的防卫政策

安倍晋三第二次上任首相后，射出了“安保三支箭”：

* 第一支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 第二支箭：《2014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
* 第三支箭：《2014-2018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一）《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日本历史上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全面规划了今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理念和目标，详尽分析国际安全环境和日本面临的新安保环境，确定日本国家安全保障课题。《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建立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4大臣会议是国家安全保障相关的外交、防卫政策司令塔，负责中长期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基本方向的策定。国家安全保障局由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海上保安厅人员抽调组成，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咨询机构，向4大臣会议一元化汇报。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的安全理念：

日本将继续坚持和平国家的步伐，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从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出发，为实现日本的安全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积极和平主义”还强调价值观防卫。“维护基于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实质就是维护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日本在战略上继续追随西方强权，目的在于加强与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映射出一种冷战式的思维方式。

在具体举措方面，“积极和平主义”强调：

* **加强军力保和平：**提高自身的威慑力和遏制力；
* **加强合作防威胁：**强化日美同盟和安保合作；
* **外交努力建秩序：**发挥主导作用，解决国际纷争。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应对的目标主要是朝鲜和中国。对于朝鲜，应对人权问题、核武器问题、紧张的半岛局势等；对于中国，应对其国防费用持续增长、缺乏透明度、迅速强化军事力量等。

（二）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2010年版与2014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区别主要有：

|  |  |  |
| --- | --- | --- |
|  | **2010年版** | **2014年版** |
| **军事战略方针** | 机动防卫 | 统合机动防卫 |
| **建军目标** | 以高技术和信息能力为支撑，具备快反性、机动性、灵活性、持续性和多用性的机动防卫力量 | 构建一支拥有广泛的后方支援基础，以高技术和情报、指挥、通信能力为支撑，在软硬件两方面都具备快反性、持续性、坚韧性及互联性的统合机动防卫力量 |
| **防卫力量运用** |  | 首次提出构建综合性势力 |

* **联合应对：**提高陆海空一体化综合作战能力；
* **灵活应对：**依据环境力量的变化，展开多样化行动，并加强在在西南海域、岛屿开展灵活行动的能力；
* **机动应对：**加强威慑与应对能力，发展高效联合的防卫力量，清晰地赋予自卫队“慑止和应对”包括“灰色区间”争端在内的各种事态以及周边海空域、岛礁、太空、网络空间等威胁的任务。

所谓的“灰色地带事态”指的是：

既不属于完全的和平时期，但又不属于战争冲突状态，处于这两者中间范围状况的描述，即介于武力冲突与和平状态之间的事态。

——《防卫白皮书》（2014）

以海上事态的应对为例：

|  |  |  |
| --- | --- | --- |
|  | **应对主体** | **应对方式** |
| **平时状态** | 海上保安厅、警察 | 调查研究、治安出动 |
| **灰色地带** | 海上保安亭、警察（自卫队配合） | 海上保安厅可以和自卫队“无缝对接”、携手应对 |
| **有事状态** | 自卫队 | 防卫出动 |

日本可以通过电话阁议的方式，扩大首相在“灰色地带事态”中迅速应对的权利，海上自卫队可以迅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因此极有可能激化纷争，导致事态快速升级。总的来说最有危险的问题就是“灰色地带事态”问题。“灰色地带事态”是指实质性军事冲突未发生的模糊状态，当出现军机挑衅等实质性军事冲突时，则演变为“重要影响事态”。

（三）安倍“新安保法案”

安倍时期的“新安保法案”的核心是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自卫队海外行动。

《新安保法案》“有限”地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包括10部小法案）规定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发动武力攻击的条件；《国际和平支援法案》说明了集体自卫权的内容，允许日本随时为处理国际纷争的他国军队提供后方支援。其主要争议点在于：第一，三个关键“事态”——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灰色地带事态——的判定由首相决定，首相在这方面权力过大；第二，新设的《国际和平支援法案》作为一部永久性法案，规定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派驻无需国会通过，只需首相授权，同样扩大了首相的权力。

安倍方面对此是解释是：重要影响事态是“若置之不理则可能导致日本遭受直接的武力攻击”“只要当日本感觉到武力冲突爆发可能会影响到日本国家安全的话，即可采取武力行动”。存亡危机事态是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受到武力攻击，并威胁到日本的存亡的事态（国内生活物资或电力不足）。

“新安保法案”的出台的一个背景是日美防务方面的发展。2015年4月，安倍访美，两国签署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根据新指针，日美军事合作地域扩大到全球，合作领域拓宽。新安保法案正是对《指针》的配合，使得日本能够在日美同盟中承担更多责任，推动日本军力扩张，并在全球使用武力。

《重要事态法案》出台后，《周边事态法》随即废除。用重要影响事态替代周边事态，突破了《周边事态法》中对自卫队后方支援行动的地理限制，是自卫队向美军提供军事支援的范围的扩大。

四、俄乌冲突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

俄乌冲突为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新的契机。

借助俄乌冲突，日本渲染安全环境恶化，将乌克兰与东亚类比，称“今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

日本借此渲染“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2021年4月营义伟访美发表《日美首脑共同声明》，“日美两国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推动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日美领导人时隔52年首次在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湾。同年12月，安倍晋三在演讲中直言，“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也即“日美同盟有事”，一旦发生危及日本生存的事态，就可与美国联手行使集体自卫权。

2022年版《外交蓝皮书》和《防卫白皮书》中强调俄乌冲突对日本的影响，重申台湾的重要性，显示出积极介入台湾问题的强烈意愿。

2022年12月，岸田文雄内阁发表“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这与安倍的“安保三文件”的区别在于：

1. 提出日本正面临“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保环境”，将中国定位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
2. 要求从根本上加强国家防卫能力；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加强与伙伴国家的安全合作；
3. 提出要拥有反击能力，在5年内将防卫预算提升到GDP的2%，防卫费总额要达到43兆日元。

从“日本有事”到“周边有事”再到“台湾有事”，日本将国家安全的概念逐步向外延伸，自身安全从本国领土扩张至边界模糊的“周边”，进而明确将台湾纳入范畴。“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话语叙事，突出紧迫的外部威胁，为日本以自卫之名修改其安全政策、提升军事力量提供借口。

第九讲 安倍内阁对东南亚海上防务合作的制度化建设

2025.4.24

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转型有两个特点：

1. 外交战略理念从经济转向经济与海洋安全战略相结合；
2. 日本与东南亚的安全合作政策重点从非传统安全（马六甲海峡反海盗）到综合安全合作（南海问题）。

那么，第二次安倍内阁为何能够实现对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防务合作的持续快速推进，深层次地介入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事务？

一、安倍内阁的东南亚外交战略理念与定位

（一）“安倍主义”的提出及其内容

2013年1月16日至1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展开再度执政以来的首次出访，访问地为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东南亚三国。在与印尼总统苏西洛的首脑会谈及联合记者会上，安倍提出日本政府针对东盟的外交五原则，作为其对东南亚外交的基本方针，被外界称为“安倍主义”。“安倍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1. 日本要与东盟国家一起努力创造并扩大自由、民主主义和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观。
2. 自由开放的海洋是公共财产，日本愿与东盟国家一起全力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欢迎美国重视亚洲的政策。
3. 积极推进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建设各种网络，促进投资，推,动日本经济复苏，并与东盟各国实现共同繁荣。
4. 日本与东盟共同发展与守护亚洲多样的文化和传统。
5. 进一步促进日本与东盟各国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

（二）“安倍主义”的特点

“安倍主义”的特点包括：

1. 不再重申日本“不做军事大国”的承诺。
2. 将“保卫共同价值观”放在五项原则的首位，“价值观外交”的重要一环。
3. 首次提出并强调海洋安全与航行自由，表达与东南亚各国在海洋安全上开展合作的强烈意愿，力图主导未来东南亚的安全格局。

（三）安倍时期日本对东南亚防务合作的发展方向与重点领域

2016年11月，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老挝出席第二届日本与东盟防长会议。会晤期间，稻田提出了日本与东南亚防务合作新倡议——“万象愿景”，第一次明确三年内合作的发展方向与重点领域。

日本与东南亚防务合作的发展历程基本可分为1990（增进相互交流与信赖关系）、2000（实践探索）、2010年（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三个阶段。成立以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的防务合作关系进入深化阶段，开始实施多种手段相结合的具体合作，以加强东盟应对“多样化复杂化海上安保课题”的能力。

防务合作的主要方式有：

1. 双方共享在海洋与航空领域的国际法认识，以贯彻和平解决争端的“法律支配”原则；
2. 人道支援、灾害救援、国际维和、网络安全等多领域的能力建设支援；
3. 促进防卫装备与技术转让合作，即技术装备的出口、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的专业人才培养和军工产业的配合。旨在增强东盟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情报搜案、警戒监视和搜索救援的整体能力；
4. 日本自卫队参加东盟举行的海上搜救与通信多国联合训练与演习；
5. 人才培养与防卫产业相关的研讨会交流。

日本此举目的在于形成一个以日本为主导的东盟合作机制，从而把日本国内对南海问题的观念灌输给东盟国家。

——樊小菊

2019年11月，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泰国出席第五届日本与东盟防长会议时发表的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防务合作新指针“万象愿景2.0”（Vientiane Vision 2.0），是基于印太视角对“万象愿景”的再定义。“万象愿景2.0”的新内容包括：

1. **日本与东南亚防务合作的实施三原则**
   1. **心与心的合作：**尊重东盟的理念，重视人际网络，倾听个人需求；
   2. **细致而长久的合作：**过程的计划性、持续性与透明性；成果可持续性；
   3. **对等开放的合作：**加强有利于东盟中心性、一体性和强韧性的国际合作。
2. **防务合作的目标：**维持和强化以东南亚地区为战略节点的“印太”→日本的“印太构想”（FOIP）与东盟“印太展望”（AOIP）的对接
   1. 强化日本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
   2. 通过强化东盟的强韧性，为东盟的中心性和一体性做出贡献。
3. **防务合作的重点领域**
   1. **贯彻法律支配：**促进海洋和航空领域的普遍性国际规范的形成与共享；
   2. **强化海洋安全保障：**促进域内国家提升把握海洋状况的能力；
   3. 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自主应对支援。

（四）安倍时期日本对东南亚防务合作的特点

安倍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的防务合作有层次性。日本对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分为四个层次：

1. 马六甲海峡沿岸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2. 中国南海岛礁主权的声索国；
3. 缅、柬、老、泰及文莱；
4. 东盟集团。

其中，前两项是日本历届政府坚持的合作重点。此外，还根据日本与不同东盟国家双边安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差异进行分类：

1. “核心国家”，即南海争端声索国；
2. “次核心国家”，即关乎海上通道安全的国家；
3. “边缘国家”。

安倍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的防务合作是制度化的。日本自2005年以来积极推进建立“2+2”机制，实现了日本与美国（1994）、澳大利亚（2007.6）、俄罗斯（2013.11，2017.3）、法国（2014.1）、英国（2015.1）、印度（2010.6 副部长级，2018.10部长级）等国之间外交和防卫官员定期会谈的部长级磋商机制。

日本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双边安全保障对话机制，始终是持续落实海洋安全战略理念的集中者。安倍上台后，力促上述三类东南亚国家与日本建立“2+2”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或在“2+2”的基础上扩大为“3+3”机制，形成由外交、防卫、海洋安全相关部门官员参加的定期磋商机制。

二、日本-东南亚海上防务合作机制的案例

（一）日印尼海上防务合作机制的建设

印尼是与日本举行“2+2”外长防长商的首个东南亚国家。

2013年12月13日，安倍访问印尼，向苏西洛总统表示：近期将决定提供七项总额620亿日元贷款，希望与印尼建立“2+2”安全合作框架。双方“关于进一步强化包括外长和防长共同会面协商在内的外交与防务当局之间的沟通达成了共识”，也围绕南海问题交换意见。

2015年12月17日，在东京首次召开日印尼“2+2”磋商会议。日印就应对“中国扩建岛礁导致南海紧张升级”，双方加强合作达成一致。两国同意今后每两年一次举行该磋商。双方同意启动有关签订防卫装备及技术转移协定谈判，并对参加2016年多国间海上共同训练与能力建设支援达成一致。日本首相安倍称，“2+2”磋商是双方“关系进化的象征”。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为了维持包括南海在内的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法治，加强海洋安全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印尼外长蕾特诺表示，关于南海，要求“当事国”不要做出加剧紧张的活动。

2017年1月，安倍访问菲律宾（2017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和越南（2017年APEC主席国）。日印尼首脑会议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强调日印尼“2+2”商安全政策磋商机制的定期召开、开展外交与防务部门间、国防部门间、外交部门间各层级的安全磋商。

（二）日菲海上防务合作机制的建设

在防务合作的宏观战略构建层面，日菲已搭建起定期首脑会谈机制，以不断强化日菲“战略伙伴关系”。在防务合作的政策实施层面，随着2011年日菲双方将副部级政策协商升级为副部长级战略对话，基本建立起四大对话机制。即外务部门间对话、防卫部门间对话、外务与防卫部门间对话，以及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和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间对话，涉及外交、国防、国内安全、情报等诸多部门。

自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日菲间海洋安全领域的防务合作在首脑会谈中议题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同时，首脑会谈机制也为具体的日菲海上防务合作项目设计与实施，确立了共同的理念目标与稳步强化的双边关系的外部环境保证。

2013年7月，安倍与阿基诺三世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开展防务当局、海上保安机构间的联合巡逻等实践性合作及各种交流活动，发展“更有建设性与互惠性”的双边关系。2016年10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日期间，两国首脑“基于海洋安全保障上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加强海洋安全合作”达成共识。

2017年1月，安倍在对菲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与菲总统杜特尔特见证了包括《日本海上保安厅与菲律宾共和国沿岸警备队之间的合作备忘录》在内的五项合作文件的签署。两国首脑就日方供给巡逻船和小型高速巡逻艇等警备器材、人员等方面继续支援菲方海上安保达成一致。

（三）日越海上防务合作机制的建设

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确立日越首脑会谈的定期机制后，日越间海洋安全领域的防务合作在日越首脑会谈中的地位不断凸显，成为落实日越防务合作具体事项的理念前提与推动日越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广泛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7年6月，越南总理阮春福在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会后两国总理共同会见记者并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日越广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首脑在强化防卫和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维持和强化有效的对话机制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并强调在两国海上保安厅的信息交换、搜查救助和应对海盗等海上安全保障领域合作。

三、“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

（一）“积极和平主义”

安倍内阁对东南亚防务合作的制度化趋势，是“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在东南亚地区的具体体现。“积极和平主义”被安倍内阁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理念，意指要将战后以来的“热爱和平”“支持和平”转变为“缔造和平”，标志着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巨大转变。

据2014年4月日本外务省公布的“东盟七国（除文莱、老挝、柬埔寨外）的对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90%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的安全保障政策，对维持含东南亚在内的亚洲的和平“会非常有帮助”或“会比较有帮助”。

对东盟的海上防务合作首次纳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设计，作为构筑“综合机动防卫力量”的组成部分。安倍内阁于2013年12月出台了被称为“安保三箭”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4年度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各计划（2014-2018年度）》，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提升对东南亚安保合作的战略定位、细化实施合作政策范围、规定具体的实施路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规定了日本对东南亚安全合作的战略定位：美、韩、澳、东南亚、印度、东南亚与日本“共有普遍价值观和战略利益”，是“占据日本海上通道要冲的传统伙伴”，今后“要延续40年以上的传统伙伴关系为基础，与东盟深化、发展政治和安全合作”。

安倍内阁推进东南亚海上防务合作的制度化建设，反映出日本建立民主海洋国家联盟的战略理念

日本的安全战略必须立足于以下三个要点：一是日本面临着大陆国家的挑战；二是日本应该与海洋国家结成联盟；三是日本应该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一个战略包围圈。

——高坂正尧

2000年《中央公论》连载了白石隆的《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作者把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对立进一步引申到“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的对立。日本与中国分别被认为是两种亚洲的代表。海洋亚洲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念的日本、韩国、东南亚、台湾和美国联合。战后亚洲的稳定繁荣有赖于美国为主导的安全保障体系。日本的未来取决于在海洋亚洲国家共同利益基础上构建的机制中取得更多的行动自由。

“安倍主义”强调“海洋国家合作”的利益诉求：“维持亚洲地区海洋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彻与和平是日本亘古不变的国家利益”，“日本四周环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日本始终从海洋安全考虑出发”，“海洋的安全与繁荣是贯穿日本外交的一个主题，实现这一目标除了依靠日美同盟，还在于|强化日本与海洋亚洲的联系”，“自由开放的海洋是公共财产，日本愿与东盟国家一起全力用法律等非武力手段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

（二）日本对东南亚ODA外交中的“安全化”趋势

2015年版《开发合作大纲》首次为日本通过ODA资金与技术的方式，深化与东南亚国家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合法性依据。ODA作为外交手段上升到战略高度，成为践行“积极和平主义”，实现“全面正常化”国家的关键手段，也从资金上保障了防务合作的持续落实。

1992年6月30日，宫泽喜一内阁制定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提出新的发展援助标准“ODA四原则”：

1. 环保和开发并重；
2. 避免援助资金用于军事用途和主张国际纠纷；
3. 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的开发及制造、武器的进出口等动向予以注意；
4. 对发展中国国家的民主化和导入市场经济的努力及基本人权与自由保障予以注意。

“9·11”事件以来，马六甲海峡反海盗与打击恐怖主义成为日本对东南亚ODA外交的重要目标。在2003年版ODA大纲运行期间，ODA实际已初步应用于日本提高东南亚国家海上安保能力，以确保日本海上通道能源贸易安全。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新ODA大纲，共同成为日本得以向东南亚国家出售或租借防卫装备的法理依据。2014年9月，日本政府召集东盟国家外交和防务负责人在东京举行“防务装备出口研讨会”，呼吁东盟国家提出防卫装备的需求。2014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安倍公开表示要向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出售巡逻、监视、救援、运输、扫雷等防卫装备。

2015年10月，日本防卫省新设的“防卫装备厅”正式成立，统一负责日本防卫装备的研究开发、调度和海外出口，以减少采购费用，并扩大对外防卫装备转移与技术合作。2020年8月，菲律宾国防部和日本三菱电机公司签订总价值达1.035亿美元的防空雷达的合同，这是日本基于“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首次出口整套国产防卫装备成品，预计2022年交付。

四、日本扩大东南亚海上防务合作的国际背景

（一）美国因素的影响与日本战略自主性的提高

2014年10月2日，美国宣布部分解除对越南的军售禁令，允许未来向越南转让与海上安全有关的防卫装备。2015年5月30日，美国国防部提出5年内支援4.25亿美元的“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Southeast Asia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旨在加强东南亚国家海上能力建设。为了实现日美同盟关系在安全合作上的强化，美国不断放松对日本在安全领域的诸多限制，从而有利于日本增强自主防卫能力。

（二）牵制与对冲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

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地区影响力的提升”，已成为日本地区战略的重要任务。安倍内阁通过强化、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整合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交流渠道，尽可能以双边带动东盟多边联合牵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壮大，从而维持和巩固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通过不断强调“中国不透明的军费增长”、“以实力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渲染“中国威胁论”，促进东南亚国家与日本的防务合作。

考虑到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存在的领士争议日益尖锐化，日本试图利用南海问题借助这些国家“对冲”中国实力，同时达到作为非当事国依然可以正当“全面干涉”南海问题的效果，从而在地区安全层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日菲、日越“3+3”机制得以快速推进。

（三）东南亚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意愿

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发展现代海军、作出“地区安全与国际贡献”两方面的长期诉求。这为日本通过构建双边防务机制，促使南海岛礁的主权争端的威胁长期化、复杂化、国际化，从而实现日本与东盟国家在地区海洋安全事务上的“共同利益”提供了必要前提。日本防卫省2012年发布的“越南安全保障展望报告”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越南自2009年以来明显提高购买与维修武器装备上的费用，反映出越南发展现代化海军的迫切需求。

东南亚国家相继设立了有别于海军的海上保安机构。这为日本借“支援海上保安机构能力强化”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对东南亚防务合作机制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防务合作制度化建设的实际效果与制约因素

日本与东南亚海上防务合作制度化建设的实际结果包括：

* 双边关系的强化；
* 防卫装备转移、联合演习、港口停靠；
*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议题和“南海问题”的关联度；
* 机制建立、运行与升级存在差异；
* 回应东南亚国家支援新造巡逻船的滞后性。

当然，日本与东南亚海上防务合作制度化建设也存在制约因素：

* 日本在机制建立与维持上的资源分配受制于日本国内经济状况；
* 东南亚国家实行“大国平衡外交”下的不确定性。双方利益诉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一致；
* 中国与南海争端声索国的海上防务合作机制；
*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

此外，也存在两个问题：目前是否产生了制度惯性？对东南亚国家而言，是否需要建立与日本防务合作的新机制？

第十讲 安倍内阁介入南海问题的路径

2025.4.24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于南海的关切是动态发展的，主要基于三点：一是南海海域被定义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二是维持美国主导下的“势力均衡”，日本不愿看到南海海域受到周边某国主导，从而使日本经济命脉处于他国控制之中；三是日本在南海海域发挥更大作用的诉求，这导致中日两国在南海的碰撞概率增多。

一、1990年至2012年的南海政策

（一）试图将中国拉入多边机制框架下讨论南海问题

日本尝试通过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增强日本影响力，在区域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1991~1994年，在日本积极推动下成立东盟地区论坛；1995年中菲美济礁事件爆发，东盟地区论坛成为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平台，日本希望将中国拉入多边机制对南海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以国际法和多边外交压力“规制”中国相关行为。

时任防务事务次官的秋山昌广表达了对南海问题的担忧；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继续提及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沙岛礁的领土争端，并积极推动主权声索国通过多边平台上的对话渠道解决争端。

除了东盟地区论坛，日本还积极推动关于南海问题的准官方或半官方多边会议，如尝试加入由印尼发起的南海争端探讨会，但由于中国的反对而未被接受。

（二）日本政府总体保持克制、低调，避免过多干预

1995年2月，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外相河野洋平在回答议员关于南海问题的提问时表明了日本政府不愿过多干预南海政策的立场。

90年代起有部分日本学者提议日本应在南海问题上发挥更直接的战略性作用。如有学者认为日本应该与东盟国家举行海警联合演习活动，并建议日本海上自卫队承担起遏制中国势力进一步扩展的责任，但这些提议都不被日本舆论和政府接受，甚至被认为是“异想天开”。

（三）以非传统安全问题为由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安全合作

2000年后，日本开始谋划通过非传统安全事务与东盟开展安全合作。2001年，小泉正式倡议缔结“亚洲反海盗协定”，并于2002年发表日本与东盟合作的“五项构想”，提出日本与东盟在反海盗、跨境问题方面进行“功能性合作”。2004年，在东京签署《亚洲地区反海盗和武装劫船合作协定》。2006年，亚洲反海盗协定信息交换中心在新加坡建立，日本被视为该机制背后的“主导力量”，该中心执行理事一直由日本人担任。

（四）开始参加多边军事演习

2005年，派遣自卫队参加美泰等国在东南亚举办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这是日本首次参加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2007年，日本海上保安厅海盗对策室向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派遣巡逻艇，并与三国进行联合训练；2008年，日本海上防卫厅派遣两艘护卫舰访问越南胡志明港，并在随后多次派遣舰艇访问越南，与越方就反海盗进行联合演习。

总之，该时期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尝试介入，日美同盟的“再定义”（“周边事态法”）也为其南海政策的进一步“外向化”奠定了基础，日本介入争端的态势已经显现。

二、2012年后“深度介入”的南海政策

（一）加强东南亚安全外交，挑起南海各方对立

第二次安倍内阁上台后，海洋安全成为日本拉近与东南亚安全关系的核心理念。“亚洲外交五原则”明确提出“日本愿与东盟国家一起全力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海洋安全”概念首次出现在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原则之中。

2013年10月，日本—东盟第16次领导人会议上，安全政策和海洋安全问题第一次作为会议议题出现；将菲律宾、越南打造成日本参与南海地区安全事务的支点国家。日本利用双边-多边场合强调南海问题和“中国威胁”。

（二）深化日美合作，并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等域外大国介入

日本支持和配合美国的所谓“自由航行”。2015年4月，中谷元防卫相在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前夕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包含南海，并不仅仅限于特定的地域”。日本

拉拢印度、澳大利亚参与南海事务，联合牵制中国的南海行动。2013年1月，安倍呼吁作为“成熟的海洋民主国家”的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以维护公海安全。2015年6月，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提出建立三边对话框架倡议；10月，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作为长期成员参加了美国、印度“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甚至在冲绳海域进行大规模演习。

（三）通过多边国际外交场合牵制中国南海政策

日本利用国际或地区多边机制介入南海问题，企图在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同时塑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

日本通过外交游说促成东盟各成员国“团结一致对抗中国”，让南海问题从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双边问题成为中国-东盟伙伴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以在南海问题上形成“合力”更有效地牵制中国，并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为日本影响力的提升创造可趁之机。

安倍还在访问英国、法国、北约、欧盟等国家以及地区组织期间谈及南海争端，企图营造“外交攻势”遏制中国的南海势力。

总的来说，2012年后日本在南海地区完成了从“有限介入”到“全面干涉”的转变，呈现出干涉程度加深、干涉方式多元化的趋势。日本介入南海政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制衡，主要手法是利用外交造势、经济竞争和观念塑造来影响南海局势，损耗中国实力，是“软制衡”的对冲战略。

第十一讲 冷战结束后的日本对华认知及其特点

2025.5.8

一、90年代的日本对华认知

90年代，中国在日本眼中是“不确定的中国”——一方面，有人开始将中国视为威胁；另一方面，又有人宣扬中国行将布苏联后尘而崩溃。

对中国的评价还没有完全确定——中国威胁论已经出现但还不是主流，日美期待中国被健全地融入国际社会当中。

——国分良成

在政界，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是台湾问题。日美安保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了再定义，如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周边事态）。

二、21世纪前10年的日本对华认知

21世纪前10年，中日关系政冷经热，日本形成了矛盾的中国观（经济机遇论——政治竞争论——安全担忧论）。在2002年“日本外交战略报告”中，日本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政治对手、安全隐患。

政治对手的定位体现在是否推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麻生太郎于2005 年东亚首脑会议前夕发表《我的亚洲战略：日本作为亚洲先行者，应成为思想领导者》；渡边利夫提出了“新脱亚论”，认为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最大的背后因素是中国的地区霸权主义；中曾根康弘则组建了“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从学术上探讨日本要建立的“东亚共同体”的特征。

2006年，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

三、2010年之后的日本对华认知

2010年标志着中日关系的转型，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拐点。有日本学者将这一年称为“世纪逆转的一年”：中日的GDP排名出现了逆转，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钓鱼岛争端发生，成为中日关系的现实问题。这意味着“日强中弱”向“中强日弱”的结构性转变，日本亟需考虑对华以经济关系为先还是以安全问题为先。

钓鱼岛争端后，日本开始着重考虑以安全问题为先。日本的对华态度具有高度连贯性，即中国崛起存在挑战和潜在威胁，但是有限和可控的——中国的“威胁程度提升”，但并未“质变”。

朱建荣认为，日本的对华认知处于一种复杂而扭曲的状况：

* **正面**

1. 中国崛起的趋势不可避免，中日综合实力对比正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2. 日本今后最大的战略问题是中日关系，要重视中国；
3. 日本经济要在中短期内复兴发展，必须利用中国发展的机遇和红利。

* **误解和偏见**

1. 中国综合实力提高会挑战现有秩序，成为霸权；（海洋权益之争等问题上已出现这种倾向）；
2. 中国“异质”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偏见，价值观外交；
3. 中国“风险”论，认为中国的发展有很多不确定性，中国国内问题堆积如山，存在“潜在风险”；
4. 疑虑“华夷秩序”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曲解。

麻生太郎于2007年在《自由与繁荣之弧》中指出，日本应该建立民主主义价值，与亚欧大陆外围国家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来加强外交关系。

四、“转型期”

（一）90年代后的日本转型

20世纪90年代后，强烈的危机意识使得日本国家开始转型，力图走向“正常国家”。但是，日本的转型异常曲折艰难：经济长期停滞，乃至于中日GDP逆转；政治动荡不定，政局一片乱象；安全方面，日本依靠美国，由于美国的相对衰弱而有不确定性；社会整体沉沦，挫折感和失落感高涨。

（二）亚太秩序的转型

21世纪，中国、印度等崛起，韩国、澳大利亚、东盟中等强国崛起，美国、日本等相对衰落，这些亚太秩序的转型都加剧了日本的危机意识。山本吉宣在《日本的大战略-如何跨越历史性的权力转移》中提出，未来世界不再是西方主导的世界，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主导的复合体世界，那么日本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如何应对新的世界？他认为，日本应主动参与和塑造对日本有利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帮助美国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使新兴国家按照西方“体系规则”行动。

（三）转型期的不确定性

进入转型期，中日关系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能否坚持？日本对中国战略上的防范和遏制加强，企图提升威慑力（加强三位一体建设：自主防卫+日美同盟+合纵连横多边安全网）。日本也尝试着塑造或改造中国的意识——能否将中国转变为对现存国际社会和亚太负责任的领导国家，是这个世纪日本外交的最大课题。

船桥洋一指出，中国崛起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最大的一次变化。中日对抗具有危险性。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的好或坏影响到整个东亚的和平与繁荣。